

翻译标准的原型范畴观

薛海滨, 王 斌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各种翻译学派不断地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对“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解读, 但始终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待翻译标准, 可以颇为合理地解释这种不统一的现象, 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标准属于原型范畴, 各种翻译标准可以同时并存, 不同翻译标准的原型源于其背后的理想化认知模型, 具体翻译标准的确立要根据实际情况, 视其背后的理想化认知模型而定。

关键词: 翻译标准; 体验; 原型范畴; 理想化认知模型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4)03-0211-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4.03.003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as a Prototype

Xue Haibin, Wang B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While different translation theories probe into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of “faithfulnes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cannot reach agreement on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suggests studying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in term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in a much reasonable way, and then proposes to incorporate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into the Prototype Theory, in which the various translation standards stand side by side, pointing to the prototype of translation standard, that is, faithfulness. The variety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 derives from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ICMs) behind them,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andard; embodiment; Prototype Theory;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一、翻译标准研究及问题

对翻译标准的研究, 一开始是围绕原作和译作的关系, 认为译作一定要“忠实”于原作, 追求与原作的对等关系, 原作是绝对的标准。在中国, 有严复的“信达雅”, 傅雷的“神似论”, 钱钟书的“化境说”等; 在西方, 有泰特勒(A. F. Tytler)的“三原则”, 奈达(E. A. Nida)的“功能对等”等。

但是, 究竟何为“忠实”, 说法总是不统一, 因此, 文质之争, 直译和意译之争从未停歇。其中, 奈达还将读者反应的视角引入了“忠实”的考量标准, 认为所谓“忠实”应该表现为译作读者对译作的反应应该像原作读者对原作的反应。

20世纪70年代, 以霍姆斯(J. S. Holmes)、列费维尔(A.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人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兴起, 翻译学开始了文化转向, 该派认为“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作和译作

收稿日期: 2013-09-17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2ZS132)

作者简介: 薛海滨(1975-), 男, 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Email: haibin_x@sina.com

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1]。这种观点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翻译标准,提高了译者的地位,突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挑战了以原作为中心的“忠实”论,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被弱化。后来,以图里(Gideon Toury)和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为代表的多元体系学派继承并发展了翻译研究派的观点,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和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着翻译的全过程”^[1],译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原作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忠实”的翻译标准进一步被质疑。

与此同时,德国兴起了功能派翻译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密尔(Hans 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该派依据行为学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2]可见,目的论要从译入者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企图打破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

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派(Deconstruction)的兴起将对以原作为中心的“忠实”标准的声讨推向极致,该派认为原作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的,原作和译作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原作的意思无法穷尽,不断产生的新译本是对原作的修订与补充。这种观点彻底颠倒了原作和译作的地位,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但是,这让翻译失去了客观有效的衡量标准,有可能使译者在翻译时随心所欲,任意发挥。

1989年,辜正坤先生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试图平衡各家说法,一举攻克翻译标准这个难题。他认为,翻译标准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我们思维方法上存在单向性或定向性的特点,他倡导立体思维,即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方式,并强调思维的空间性和暗示思维主体者的作用,进而提出翻译标准不可能是唯一的,应该将原作视为绝对标准,绝对标准只是一个出发点,因为译作永远不可能完全忠于原作,达到这个标准就意味着一个字都不翻;在绝对标准之下,应该有一个最高标准,他称之为最佳近似度,以代替“忠实”这个字眼;最高标准之下还有无数的具体标准。这就是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所谓互补性,即“一个翻译标准所具有的优点,正是别的翻译标准所具有缺点”^[3]。

辜氏理论的优点是它的确为我们看待翻译标准打开了一种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各派的争论,让大家以更客观的方式看待翻译标准,不要再厚此薄彼,因为视角不同,翻译标准就不可能统一。但是,他提出的最佳近似度这个概念仍是一个不可衡量的标准,试问直译和意译到底哪个离原作更近呢?不同的译者对原作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如何能知道译作离原作的距离到底是近还是远呢?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我们对于翻译标准的认识一直停留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认为所有译者都有可能对原作有更为“客观”的解读,译作与原作的距离是可以衡量的,因而能寻求一个终极的翻译标准。但是,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的体验(embodiment)对认知客观世界的重要性,而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恰好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认知语言学认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客观现实会有不同的体验,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不同译者对同一本原作也会有不同的体验,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因此,很难寻求一个终极的翻译标准。那么,人类的翻译活动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终究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底该向何处寻呢?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the prototype theory)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翻译标准的范畴化

范畴(category)是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指人们在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映,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型’概念构成的”^[4]。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认知源于体验,始于范畴化(categorization),先有范畴,然后形成概念。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任何一个概念都对应一个范畴。

对范畴的研究源自亚里士多德,起初是经典范畴理论,将范畴视为一组拥有共同特征的元素集合体,认为特征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后来,哲学家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对此提出质疑,他通过对GAME的分析研究,指出范畴边界具有不确定性,提出了“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这一概念,把范畴比作家族,认为家族成员容貌有相似之处,但彼此又很不一样。20世纪70年代,在维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论的基础上,Eleanor Rosch和她的同事们对经典范畴理论

进行了批驳,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主要指的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范畴。Rosch & Mervis (1975) 曾将家族相似性定义为:“... a set of items of the form AB, BC, CD, DE. That is, each item has at least one, and probably several, elements in common with one or more other items, but no, or few, elements are common to all items. (能构成 AB、BC、CD、DE 关系的一组成员,就是说,每个成员至少有一个,也可能有几个,与其他一个或更多成员享有共同成分,但没有一个或很少几个成分是所有成员都共同享有的。)”^[4] 也就是说,范畴成员之间的界限具有模糊性(fuzziness),无法加以准确的区分。“原型(prototype)”指抽象的对范畴成员的图式表征(schematic representation),即范畴成员的属性集合。

翻译标准作为一个概念,也必然经历一个范畴化的过程。“信达雅”、“神似论”、“化境说”、“功能对等”、“目的论”、“多元互补论”等中外学说都是翻译标准这个大家族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连续体,边界模糊,互补性强,且具有开放性。这些家庭成员无一例外地从不同角度指向同一个点,即“忠实”,“忠实”就是翻译标准范畴的原型。该原型并非是将原作视为中心,而是一种抽象的、高度概括的意象图示的表征(schematic representation),可作为翻译标准的认知参照点。翻译标准的任何家族成员,无论强调译作内容上忠实原文,还是强调风格忠实于原文;无论是语篇功能的近似,还是读者反应的近似,都带有“忠实”这一原型的影子。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越少,译作就越接近原型;反之,则越偏离原型。

与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标准观相比,用原型范畴观解释翻译标准有如下优势:第一,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忠实”的翻译标准。传统翻译标准认为“忠实”是一个客观存在,是译者应该追求的目标,译作应该并且可以不断地向原作靠拢;认知语言学认为“忠实”只是一种理想化认知,是一个原型概念,可以作为翻译标准的参照点,译者在翻译时的出发点,但绝对的“忠实”现实中并不存在,不同的译者对原作的体验不同,对“忠实”的理解也不同,这正是“忠实”论不断受到挑战的根本原因。然而,无论各家各派怎样质疑该标准,却总是无法脱离该标准,所有的争论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第二,更为合理地解释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原型

范畴具有开放性,因此译者也必然具备一定的创造性,不同译者对原作有不同体验,也会对原作做出不一样的解读;但是,由于原型效应的存在,并没有必要担心译者会信马由缰,致使译作完全偏离原作,成为译者的创作。同时,这也解释了解构主义学派“作者死了”的观点,即不同译者会对原作多角度地进行不同解读,原作和译作会形成互补关系,但不会导致译者因此而任意解读原文,随意发挥进行翻译。例如,中国清末翻译家林琴南自己不懂外语,却翻译了多部外国文学著作,译作错误很多,却被奉为译界典范,钱钟书先生对他评价很高,何故?就是译者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没有完全偏离原作使然。第三,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对原作和译作关系的理解呈现“一边倒”的模式:先是要求译作绝对忠实原作,原作是主人,译作是仆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的地位突显出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大家开始关注译作读者的反应和译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就像一块翘翘板,不是这边高了那边低了,就是这边低了那边高了,始终难以找到平衡点。即便是辜正坤教授的多元互补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各家各派理论学说的有效调解,也更为客观,但还是没有跳出原作是核心的传统思维,因此也没有更好地解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问题,译者无法确切地知道译作离原作有多远,什么才是真正的“最佳近似度”。认知语言学体验观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源于人的体验,不同译者对原作体验不同,译作自然就会不同,译作应该是译者通过原作和原作者进行的一次思想交流的产物,译者的思想和原作者的思想就如同父母亲,译作则像一个新生儿,新生儿会带有父母双方的影子,但同时又是一个独立的人。因此,译作中既包含译者主观思想,也包含原作者通过原作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两者有机地契合在一起,不能简单地以原作为中心,还是以译者为中心;也不能简单地说明原作和译作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结论是,原作是媒介,译者通过原作跟原作者进行跨时空的思想交流,其产物是译作,原作和译作的地位是平等的,译者和原作者的地位也是平等的。

三、翻译标准确立的依据

翻译标准的本质是原型范畴,翻译标准确立的依据就是其原型产生的根源。Lakoff 为了阐明原型

的来源,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的概念。“所谓ICM,就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4]Lakoff认为范畴构成及原型效应都是ICM的副产品^[5]。也就是说,所有的概念都对应一个范畴,所有的范畴都有一个原型,原型源自作为其特定背景的ICM。根据Lakoff的观点,原型效应主要有如下四个来源^[6]。

(一) 最简单模型(the simplest type of typicality effects)

最简单模型是指由于ICM的不匹配而造成的原型效应。最初的“忠实”翻译标准指的是译作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要绝对服从原作,这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忠实”标准背后的ICM。如果译作恰好能对应这个ICM,则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作;反之,则是不忠实的译作。例如:将“I am a student”译为“我是一个学生”,这是忠实的译文;但译为“我在上学”则被认为是不够忠实的,因为该译作只是内容符合原作,形式却背离了原作。之所以“我在上学”也是可以接受的译作,是因为译者认为译作内容符合原作,同时不违背译入语标准,可以为译作读者所接受。换言之,“我是一个学生”背后的ICM仅关注译作与原作在语言上的对应程度,而“我在上学”背后的ICM淡化了语言形式的对应,同时关注了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度。当两种ICM不匹配的时候,“我是一个学生”这则译作就更接近“忠实”翻译标准的原型。

(二) 集束模型(typicality effects due to cluster models)

集束模型是指多种ICM交织在一起,通过突显其中一种而形成的原型效应。随着人们对“忠实”这一标准认识的深入,“忠实”所对应的ICM已经不限于探讨原作和译作的对等关系,最起码有如下几种。

语言本身:译作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与原作对等;

语篇功能:原作在源语文化中的功能与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功能对等;

读者反应:原作读者对原作的反应与译作读者对译作的反应对等。

这几种ICM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忠实”这一翻译标准。不同的翻译学派对翻译的认识不同,会

突出其中的一个方面,原型效应就会产生。例如,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前,大多数学者从纯语言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则会突出译作语言与原作语言本身的对等关系;功能派翻译理论突出语篇功能的对等;翻译研究学派和多元体系学派更看重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则会抬高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淡化译作与原作语言上的对等关系,更突出译作在译语文化的接受程度,即读者反应。

(三) 转喻模型(typicality effects due to metonymy)

转喻模型指的是一种部分代整体(part-for-whole)或整体代部分(whole-for-part)的ICM模式,如“我读过鲁迅”,即用“鲁迅”这个作者的姓名来代指鲁迅的所有作品,“鲁迅”即具有原型效应。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当中同样也存在这种模型,最典型的就是用严复的“信达雅”这个典范(paragon)来代替一切的翻译标准。很多学者不断在质疑此标准是否真的能作为翻译的通用标准,从转喻模型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信达雅”只是翻译标准范畴中的原型,对很多翻译作品的评价可以向他靠拢,但绝不能说“信达雅”就是翻译的唯一标准。

(四) 辐射范畴(radial categories as a further source of typicality effects)

假如把前文所述集束模型里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当作“忠实”翻译标准的复合原型(the composite prototype),那么围绕该原型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次生范畴的翻译模式(subcategories),如改译、编译、删译、节译等(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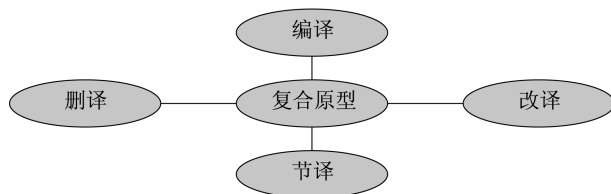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标准的辐射范畴模型

Fig. 1 Radial categories model of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次生范畴是文化的产物,无法依据复合原型来预测,即复合原型的“忠实”翻译标准本身无法产生各种次生翻译模式,仅是因为文化发展需要,才会诞生各种次生翻译模式,但不管哪种次生翻译模式的产生,都必须以复合原型的“忠实”翻译标准为基点。次生范畴与复合原型的接近程度则会产生

原型效应;此外,随着各种次生翻译模式作为特别的翻译模式被某种文化接受,则不同的次生翻译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原型效应。

综上所述,翻译标准是原型范畴,原型是一种ICM,可以作为译者翻译的出发点和评价译作优劣的参照物,但没有哪个译作可以绝对符合“忠实”的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确立应该依据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中的ICM,并非一成不变。

四、结 论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标准,将人的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即译者对原作的体验——纳入了考量体系,弥补了以往结构主义将原作绝对化以及对原作、译者和译作主次关系认识不清的不足,提出从原型范畴的角度来解释翻译标准,将“忠实”视为翻译标准范畴的原型,该原型仅是一种理想化认知模型(ICM),随着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而不

断改变,翻译标准的确定并非是固定的,而是随ICM的变化而变化的。

参考文献:

- [1]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2] 张锦兰.目的论与翻译方法[J].中国科技翻译,2004(2):35-38.
 - [3] 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J].中国翻译,1989(1):16-20.
 - [4]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5] Lakoff G.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6] Evans V,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编辑: 巩红晓)
-
- (上接第210页)
- [3]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02.
 - [4]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9.
 - [5] 李红玉.性别与翻译——论翻译中的性别视角在国内的发展与现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18(1):49-52.
 - [6] 李文静,穆雷.翻译性别他/她者——论译者的双性视角[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24(3):97-101.
 - [7] 穆雷.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33.
 - [8] 袁毅.浅论儿童文学的翻译[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17(4):73-76.
 - [9] 付玉群.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汉译谈起[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1):61-65.
 - [10] 武文玉.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教育与男孩女性化[J].继续教育研究,2008(12):129-130.
 - [11] 任文杰.从女性视角观照儿童电视广告对儿童性别社会化的影响[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3):337-340.
 - [12] 马悦,穆雷.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新视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3(6):66-70.
 - [13] 徐家荣.儿童文学翻译对译文语言的特殊要求[J].中国翻译,1988,9(5):15-19.
 - [14] Baum L F. The Wizard of Oz Series[M].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of Shanghai, 2009.
 - [15] [美]莱曼·弗兰克·鲍姆.绿野仙踪[M].陈伯吹,译.吉林:长春出版社,2009.
 - [16] [美]莱曼·弗兰克·鲍姆.绿野仙踪[M].马爱农,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17] 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中国翻译,2004,25(6):33-36.
 - [18] Twain M.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 [19] [美]马克·吐温.王子与贫儿[M].张友松,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 [20] [美]马克·吐温.王子与贫儿[M].曹海英,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 (编辑: 巩红晓)